



第七期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會刊

譚丕龍

鄞縣新四軍研究會編

一九九五年六月

E 297.3-55 470/v7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

1995年第2期(总第七期)

目 录

张群洁: 得道多助, 正义战胜邪恶——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1)
秘书组: 鄞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4)
鲁 刚: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鄞县妇女	(6)
崔岙村妇女支援抗日	(13)
观顶村妇女拾子弹	(13)
翁绍初: 红岭抗日民主俱乐部	(14)
秘书组: 日本侵略军在鄞县的暴行	(16)
杨祥瑞: 日军纵火大较变废墟	(22)
王仁甫: 控诉日寇罪恶	(24)
翁绍初: 鬼子火烧红岭	(25)
张宪成: 统战工作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作用	(26)
戚武光: 保卫何司令同田胡子谈判	(30)
鲁 刚: 抗日战争时期鄞县女区长——舒文	(32)
张宪成: 抗日战争时期鄞县战役、战斗简介	(34)
秘书处: 借窝生蛋, 发展壮大	
——试析鄞县人民抗日武装(林大队)的成长	(41)
许伦敦: 夜袭鬼子	(43)
童振扬: 征粮筹饷——回忆在三北税卡工作	(50)
王玲储等: 组织起来打鬼子	(53)
王元兴: 忆战友杨来西	(54)
鲁 刚: 政治交通员周毓英	(55)

编辑: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秘书组

印刷: 宁波新华印刷厂

责任编辑: 鲁刚 编审: 张宪成

1995年6月付排

得道多助、正义战胜邪恶

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张群洁

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是100多年以来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洗雪了耻辱，废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加我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包括台湾在内被日本侵占的领土。这次战争，我国把日本帝国主义总兵力三分之二以上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减轻了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场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回顾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和胜利的经验，是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它必将振奋人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祖国的统一，并为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1937年7月6日，日军在宛平县附近军事演习，借口一士兵失踪，至7日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这是侵略者故技重演，是现象。日本是一个小国，它敢于发动侵略大国的战争，除了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本性外，主要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政治腐败，独裁专政，实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造成人心涣散，生产破坏，经济萧条，家贫国弱，给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也助长了日本侵略野心的扩张，妄图独占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并成为它征服世界的后勤基地。但是，它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了全国人民，进行坚决抵抗，用了3500多万军民的生命，最后把侵

略者打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命令驻东北的中国军队撤退到山海关以内，日本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东北三省。接着，日本步步进逼，发生“一二八”事变，冀东事变。国民党政府又被迫签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发动民众，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控诉日本侵略暴行，唤起民众，反对日本侵略。1935年冀东事变，威胁了全国人民的生存。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行动，得到包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上海、南京、天津、杭州、广州，武汉和宁波等大中城市学生，积极响应，先后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各界联合救国会，推动政府抗日。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懈努力，把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和各界人士团结起来，特别是同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胸怀，不计前嫌，派出代表与其谈判，晓以大义，作出让步，在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上，重新合作。最终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就有力量，团结才会胜利。中国共产党十分珍惜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战争过

程中，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内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亲日投降派的叛国罪行给予彻底揭露，坚决打击。对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磨擦，破坏合作的错误，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揭露顽固派制造分裂事件的真相。经过各方工作，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反动势力。顽固派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停止反共。使国民党政府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直到抗日胜利。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法宝之一。

人民战争，是弱而大的中国战胜小而强的日本又一重要法宝。抗战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狂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国内多数人对战胜日本缺乏信心。有“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有把战争寄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苏联出兵，英美干涉，日本很快会失败的“速胜者”。在战争方针和战略方面，国民党政府主张政府、军队抗战，在战略上采用防战等单纯政府军队抗战的片面思想。国民党片面抗战思想是它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局限性所致。这不是国民党政府看不到人民力量，而是他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危及独裁专政。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两国的国情，提出全民总动员、全军总动员的全民战争方针。明确指出：全民战争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的前途。在战略上提出实行积极防御方针。即正面防御，在敌人侧翼、后方发动游击战、破袭战。在华北战场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进行批评教育，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英勇作战，努力杀敌，用实际行动教育“亡国论”者。1937年9月，正当上海

战场战争进行最激烈时，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山地设伏，在日军板垣师团21旅团主力进入伏击地区内，突然发起猛攻，包围、分割敌人，展开格斗，歼灭敌军1000多人，击毁军车100余辆，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大长了民族志气，振奋了人民。这对“亡国论”者战必败一次生动、有力的回击。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除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外，积极深入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敌人占领区，开辟敌后战场。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从敌后打击敌人，拖住日军，支援正面战场。由于国民党政府指挥失误，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亡国论”等错误谬论又再泛起。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抗战10个月经验，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演说。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教育批评，澄清了混乱思想，为抗战胜利进一步指明方向，推进了抗战。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广州，感到无力进攻了。日本军方已感到敌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严重威胁，战争越拖越对自己不利，怕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淹死。它改变了战略方针，正面战场停止进攻，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对根据地开展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和铁壁合围；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摆脱困境，实现灭亡中国的幻想。自此起，中国抗日战争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日本侵略者失败的命运。他越疯狂、残酷，越激发中国人民的仇恨和反抗力量。这就是“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占区，

依靠人民，发挥一切有利条件，开展反扫荡斗争，部队同群众结合，发扬英勇奋斗革命精神，在山区、平原、河湖港汊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时聚时分、集中优势、出敌不意、进行伏击，取得胜利，迅速转移。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人心脏地区，采用公开和隐蔽相结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争取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和隐蔽根据地，把敌伪统治的心脏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就这样，把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据1941年、1942年两年统计：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民兵、共作战42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建立了包括浙东在内的19块抗日根据地。改变了中国的抗日局势。自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开始全面反攻。到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共产党领导的120万人民军队和200万民兵，解放了150座县城以上市镇，并把日军围困在交通线据点和城市的据点里。当时国民党和军队，还远远躲在重庆和西南、西北地区。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员的理论、政策水平，提高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对日作战。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举办各种学校、训练班和召开各种会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总结历史经验和战争经验。帮助党员干部克服错误思想和政策上产生的问题。提高认识，增强团结，行动一致。这是抗战胜利的组织保证。通过学习、整风，纠正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中先左倾“关门”主义，而后右倾投降等错误。坚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经过整风，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分清了是非，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了认识，克服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团结，提高了战斗力。经过整风学习，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后来被称为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依靠这种革命精神，战胜了国内外敌人，也依靠这种精神，克服了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增加了新的战斗力量。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接受民主人士的正确意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领导带头，人人动手，发展生产。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机关、部队的粮食、蔬菜达到部分自给，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生活。密切了党、政、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人民是战争胜利的源泉，也是一切事业胜利源泉。党自身组织的建设好了，增进了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保证了甘泉长流不息。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回顾抗日战争历史，我们不能忘记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和耻辱，不能忘记被侵略的惨痛教训，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去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他们仍敌视我国，还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收买民族败类，制造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妄图把我国变为他的附庸。我们学习抗战胜利经验，要发扬延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作风，振奋精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加强团结，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作出新贡献。

鄞县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本会秘书组搜集整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鄞县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多次镇压而破坏。党员外出或潜伏隐蔽，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被镇压下去。受“一二九”运动影响，鄞县抗日救亡运动又逐步恢复，至“七·七”事变，掀起高潮，推动了全县人民投入抗日斗争。

1936年初，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派刘良模来宁波宣传抗日救国，点燃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火苗。是年夏，上海大学学生姚常新、周国瑞、张世璇等暑假回甬，在鄞县城区职业青年及中学生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联络范雨峰、谢相箴、鄞家箴、汤宜均、陆达平等10多个青年成立“今日读书会”。陈士标领导成立“江东读书会”。读书会组织会员阅读：《大众哲学》和《生活周刊》、《世界知识》、《中国妇女》、《光明杂志》等进步书刊，讨论时事，举办暑假补习班和民众夜校，成立“时代剧社”，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暑期补习学校结束，“今日读书会”和“江东读书会”经过协商，于同年10月，以两个读书会为基础，联合成立“宁波各界救国联合会”。参加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有钱庄业青年店员、商业学校、鄞县女中、甬江女中、茅山简易师范、机关职员、小学教师、祥泰木行、永耀电灯公司等进步青年、学生和职员。“宁波各教会”组织成员传阅中共《八一宣言》、沈钧儒《抗日御侮的几个条件》和《田中奏摺》，以及油印《红军长征记》等，讨论时事形势。使会员相信共产党真正抗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提高了会员的民族觉悟

和爱国主义精神，认识到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停止内战，团结各党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刻不容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影响逐步扩大。国民党鄞县县党部派特务混入“宁波各教会”，向主子告密，

“西安事变”国民党十分害怕，于14日傍晚，派出反动军警逮捕了宁波各教会的12名主要成员。宁波抗日群众组织被破坏。但是“宁波各教会”在群众中留下了良好印象，为“七七”事变后发动全民抗日奠定了一定思想基础和锻炼一批领导抗日运动的骨干力量。

1937年春，中共党员、燕京大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参加者卢琼英，从北平回家，联络前“宁波各教会”成员十余人，再度秘密成立“卢家读书会”，学习《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及进步报刊。“七·七”事变后，读书会进一步扩大，开展抗日宣传。“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洪流的推动下。浙江省和鄞县当局开始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允许开展抗日宣传。成立了抗日后援会。国民党驻鄞县党政军机关，先后成立了许多宣传队，其中较大的宣传队有：宁波防守司令部宣传队、鄞县县政府宣传队、抗敌后援会宣传队、鄞县妇女会宣传队、鄞县县党部宣传队、一九四师政治部宣传队、青白儿童宣传队等十多队。卢琼英领导的“卢家读书会”为了争取合法地位，几经与抗敌后援会交涉，改名为“第四十二宣传队”，卢琼英任队长、张常醒任副队长，

到和丰纱厂、庄桥、东钱湖和观音庄等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颇受群众欢迎。10月，卢琮英北上延安，由唐华等负责，队员发展到百余人。

经过“读书会”、“宁波救国联合会”和“四十二宣传队”的动员，自1937年9月，先后有近30人分二批北去延安参加抗日，其中有10人参加新四军。留鄞县的多数成为抗日战争的骨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在鄞东南农村以小学教书为职业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发动当地学生和青年，成立“生活剧团”、“读书会”、“少年民族先锋队”等群众抗日组织，开展抗日宣传。9月，中共宁波临时特别支部在鄞东南成立，秘密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与当时鄞县县长陈宝麟开展统战工作，经过协商，成立了“飞鹰团”。在洞桥天王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在樟村，由共产党员崔晓立领导成立了“垦荒团”。1938年在国民党的威逼下被解散。

驻鄞县县城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组织的宣传队，在抗日开始时活动一阵之后，逐渐冷却下来。中共鄞县党组织为把抗日救国运动持久、广泛地开展起来，动员各界人士参

加抗日。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这些合法的抗日宣传队，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进步队员，使宣传队再度活跃起来，到街道、工厂、学校、农村进行宣传。举办民众夜校，工人夜校，组织读书会和抗日宣传队。吸收积极分子参加中国共产党，秘密建立党的支部。

1938年秋冬，由中共鄞县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宁波学生周刊社”成立。1940年，和丰纱厂工人夜校和工人宣传队”成立。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党领导组织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先后被国民党鄞县当局解散。参加国民党各种宣传队的共产党员，为了保存力量，除面目没有暴露外，所有党员全部撤出，转入农村或学校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县城沦陷后到鄞西、或其他各县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他们运用读书会、办农民夜校、识字班等形式，组织农民、妇女读书识字、学文化，宣传抗日形势、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游击区和根据地组织农会、妇女会、自卫队、工会、姐妹会和俱乐部等抗日群众组织，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建设和抗日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鄞县妇女

鲁 刚

1943年10月，陈洛宁代表妇女在庆祝鄞西六七两区联合办事处成立大会上作“半边天”发言，表述了鄞县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和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地发挥的作用和贡献。

妇女占鄞县人口一半左右，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妇女蕴藏着的巨大力量没有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妇女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反对封建礼教、参加社会各个领域活动，并显示出重要作用，人们对妇女的认识才逐步提高。

抗日战争爆发，鄞县先觉悟的妇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发动组织农民、工人、青年学生及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女干部和女战士。1941年4月，鄞县县城（宁波）沦陷，她们利用妇女便于化装和善于接近群众，特别是易于接近妇女群众的有利条件，投身于抗日斗争的前线，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起到半边天的作用。据统计：自宁波沦陷至抗战胜利，女党员干部任县政协委员4人，县委常委3人、（含鄞慈、鄞东南县工委）、县委秘书5人，区委书记7人、副书记3人、县交通站站长3人、区委委员11人、乡及学校支部书记6人。1942年9月至1943年春，鄞奉县县委下属4个区工委，有3个区委书记由女党员干部担任，其中樟水区委先后共16个委员（1943年初至1944年）有10个女委员（3个书记、2个副书记）、医院院长1人。广大农

村妇女积极掩护干部战士和伤病员、做鞋袜被服支援抗日武装，送子送夫参加抗日队伍。李敏、陈晓云、袁春妍还为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一、开展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三省，1932年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1935年向华北发动侵略。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民众运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鄞县籍“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员刘良模、上海大学女生姚常新回家乡宣传抗日，宁中、高工、鄞县师范等校女生和女中学生相继成立读书会、时事讲座会，并加入“宁波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暑假，北京燕京大学女生卢琼英回家成立“卢家读书会”。“七七”事变消息传到鄞县，鄞县县城成立了10多个宣传队、有50多名妇女参加，和男队员一起在剧场、街头和城镇、农村巡回宣传，演出《死里求生》、《八百壮士》、《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方言剧、活报剧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向工商界和社会著名人士开展募捐演出和义卖演出，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募捐、义卖所得，女宣传队员废寝忘食赶制棉衣、寄往前线，供战士御寒。

宣传队还举办民众夜校，组织农民、工

人、妇女学文化、学政治、讨论时事；设立广播电台，播放救国歌曲、广播剧和时事报告，组织晨呼队在大街小巷呼喊抗日口号；在街头巷尾和农村墙上书写抗日标语，画抗日壁画。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掀起反共高潮，鄞县国民党组织派特务监视共产党员、进步爱国青年宣传队员，排黑名单，宣传队头头将爱国宣传队员开除出宣传队。中共鄞县县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及时调整组织，把在宣传队里出头露面活跃的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撤出，转入工厂、农村、学校。自此，各种抗日宣传队宣传活动沉寂下来，无形解散。

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义愤填膺，在县委的领导下，女党员和爱国女青年，坚持在工人、青年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时事讨论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女党员姚筠加入妇女救亡工作队，团结沈儒珍等进步女青年，深入市区工厂，对女工的政治思想、生活情况调查。在和丰纱厂举办夜校，她和李峰担任教员，动员女工参加夜校学习，教女工识字，并去女工家庭访问，建立感情。在夜校学习的女工逐步懂得剥削的原因。在姚筠的帮助下，女工团结起来，和资本家说理，迫使厂方在停工期间发给生活费。斗争的胜利教育了广大女工，林秀美等5人加入共产党。东钱湖大昌布厂女工在女党员钱珂芹等启发教育下，三、四个女工加入共产党，这两个厂建立了党的支部。

甬江女中中共党员应志奋团结进步学生傅赛英、江涛等同学，冲破了教会学校禁止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规定，联合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举办“时事讨论会”，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话剧。死水般的甬江女中，燃起抗日的热浪。傅赛英、江涛等先后加入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宁波学生周刊社”

等抗日组织。女生共产党员葛维凤在鄞县茅山师范联合同学组织读书会，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活动，组织同学上山学打游击，发展进步势力。学校当局借学生在校里只应读书的籍口，对她们行动派人监视。她根据县委和青委的指示和学校的情况，与支部党员在校里开展“三个坚持、三个反对”斗争，发动同学签名罢课，要求抗日自由，带领同学到奉化方桥、竹林一带宣传抗日。国民党鄞县教育局迫于社会压力，进行调解，答应学生的要求，以斗争求团结取得胜利。潘火桥女青年韩毅、石碶小学女生张晓湘、张林湘，古林补习中学女教师吴春帆等组织失学学生、失业工人和在校的同学也先后组织读书会，开展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读书活动，学《大众哲学》、《彷徨》、《呐喊》、《家》、《春》、《秋》、《西行漫记》和《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学唱抗日歌曲，开展歌咏活动，讨论国外时事和抗日形势、国共合作前途、社会为什么造成贫富两个极端？中国革命和个人前途？妇女解放和妇女守厨房等问题，自编自印小刊物，交流学习心得，到社会上宣传抗日。参加读书会的男女青年、学生，在读书和抗日宣传中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不少人从苦闷、彷徨中看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光明前途，走上了革命道路，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果断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二、掩护党的机关、党员干部和战士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鄞县国民党政府搜捕共产党员，党组织被迫转入秘密领导抗日。国民党经常采取突击检查户口，派特务跟踪被认为可疑的人，特别是把单身者作为重点跟踪对象，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随时有被破坏和被捕杀害的危险。掩护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工作。为此，党采取建立家庭机关掩护，这个任务自然而然

地落到女同志的身上。1940年周飞任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单身一人，是国民党特务侦察重点对象，上级党组织决定，他与上海美亚四厂女工钱珂芹结婚，掩护县委机关。刚填好入党志愿书的钱珂芹从上海来到宁波，用做工的积蓄，购置一些家俱、炊具建立一个简朴的家庭。当时，县委领导人活动经费和生活补贴每月仅5元，生活十分艰苦，而工作却非常繁忙。钱珂芹的工作：一是掩护，保卫安全；二是照顾领导干部的生活，让他吃好、睡好、身体健康。领导干部外出活动，她按县委规定在指定地方安放安全暗号，若发现迹象可疑的人，就装作搞卫生把暗号转移，使来联系的同志作好应变，防止意外。领导干部聚家开会，她用自己的钱买些好菜改善生活，在家门口边洗衣洗菜，边观察情况。1941年同周飞一起去苏北解放区。1942年4月，周毓英以保姆身份到田央黄宁属特派员王文祥家掩护机关，兼政治交通员。后来周毓英又到鄞西建岙掩护鄞县县委机关兼交通员。鄞县特派员寿文魁是周毓英的丈夫，公开职务是建岙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五六十斤稻谷，他俩依靠微薄薪水艰苦生活，一日两稀一干，咸菜汤、咸鱼干下饭下粥。1943年，三东地委决定汪诚功建家庭机关，葛维风与汪诚功结婚，以富商夫人身份，在鄞东殷隘建立机关，掩护鄞东南县委和三东地委。同年5月，上级党领导加强浙东抗日根据地领导力量，周飞等一批领导干部回浙东，周飞任鄞奉县委书记，钱珂芹以逃难名义，在建岙开米店掩护。周飞以米店老板身份外出领导鄞西的抗日活动，钱珂芹为老板娘与一个伙计（女党员、县委政治交通员）在店里做买卖。她和伙计一起搬运稻谷、磨米、卖米。抽空做邻居的工作，了解群众疾苦，为邻居排忧解难。每逢过节，买些鱼、肉等好菜，送给邻居。自己却非常节俭。

广大农村妇女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不

怕“通匪”的罪名，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接待来家的党员干部、抗日战士，对他们的生活热情接待，掩护照顾伤病员，收养干部子女，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

三、交通联络

抗战时期，邮政、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都被国民党和敌伪控制，处在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救国运动中为了安全，一切书信、文件、情报都要秘密传递，只能建立秘密交通线——交通联络站，实行单线领导，由交通员专人传递。妇女易于化装，不易引起敌人注视，就成了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力量。1940年冬，在大昌布厂做工的钱珂芹，在殷家湾建立联络站。县城沦陷，敌伪军在集镇和交通要道设立封锁线，把鄞东南与鄞西分为两部分，广大农村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杂牌游击队控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处在敌伪顽三角斗争极为复杂而又恶劣的环境之中。为了及时、准确地收集敌伪顽的情报和传递党的指示、书信、文件，转送干部，采购军需物资，党逐步建立起以妇女为基本力量的、组织严密的交通联络站。1941年夏天，陈洛宁、徐紫云在郭青白的鄞西游击自卫大队建立联络站。1942年周毓英、葛维风分别担任鄞奉县委、鄞东南工委政治交通员，陈晓云在梅园乡公所建立联络站、梅园乡边家孙妈妈（孙辛田母亲）家联络点，后隆小学张一康联络点，孙王小学丁新民联络点，鄞东少白小学蔡国榕联络点等。是年冬，敌伪在各乡建立情报网，梅园乡陈晓云派崔永甫充任情报员，向敌伪送假情报。1943年初县交通联络站建立，陈洛宁任站长。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前夕。中共鄞奉县加强交通联络的力量，建立区、乡联络站和联络点，形成了系统严密的交通联络网。并调整领导关系，县站组织由县委领导，业务直接由四明专署交通联络总站和新四军浙东纵队

参谋系统管理，区、乡联络站（点）由县联络站和区党、政、军双重领导。反顽自卫战争胜利，县政府成立，建立县政府联络站和交通班。县、区、乡联络站的负责人及交通员主要由妇女担任。

在交通联络站工作的妇女交通员，她们发挥了机智、沉着、勇敢、不怕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顶酷暑，冒风雨，忍饥挨饿，爬山涉水，不分昼夜，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林立的据点，直至敌人占据的心脏——宁波城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刘英爱人陈魁梅从温州至台州转移到鄞西，由交通员掩护，安全送至上海。浙东区党委派谢飞来鄞西指导工作，由边家孙辛田的母亲接待掩护，再至鄞奉县委。梅园乡联络站陈晓云采用假情报办法，并设计骗取敌人对梅园乡的情报站的信任，使敌伪不随便到梅园乡骚扰，党和抗日武装活动更为安全。1943年春，周毓英为县委去古林提取数万元伪币，回来在大桥附近看见从鄞江桥方向过来一小队鬼子，她急中生智，转入田间小路，避开敌人，沿山脚小路安全回到建岙。

“九·五事变”前夕，宁警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郭青白借整训为名，企图吃掉党领导的林大队，交通联络站在8月底、9月初几天中连续把关于郭青白阴谋的情报及时地送给县委及新四军浙东纵队，县委根据情报作出果断决策。林大队在9月5日凌晨抢在郭青白下毒手之前从郭的包围中拉出，与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会合。交通联络站除完成交通联络任务外，还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

四、办医院、救死扶伤

鄞县农村在县城沦陷前，就缺医少药，大病重病到县城求医，农村集镇小药铺药品均向县城采购。沦陷后，敌伪军封锁，药品药械奇缺，有病就医，困难重重。中共鄞奉县委为了解决军民就医的困难，保护军民身

体健康，决定创办医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42年秋，女医务人员周亨佑受林一新大队长委托和陈近、俞远二名女医务人员共同创办林大队医务室，为军民治疗疾病，并经常去四明山根据地为领导干部检查健康，为女干部作产前检查，产后护理。她和爱人戴乐逸打扮一对时髦大方的夫妻，通过敌伪军封锁线，潜入县城，采购药品、药械。

1943年，鄞西地区时疫流行，戴乐逸等接受党的委托，创办古林临时疫病医院，周亨佑、张桂芬等担任医师和护理，开展防疫、治病。

1945年春，四明专署惠明医院总部和鄞西分院分别在鄞西长沙潭和樟村建立，陈洛宁任总部领导委员会委员、指导员、孙吟月任鄞西分院院长。当时医护人员缺少，举办护士训练班培训护士，陈洛宁任训练班指导员。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姑娘和小青年，训练班是流动的，边学习、边实习，白天学习，夜里行军，到了驻地，陈洛宁教学员做群众工作，了解群众疾苦，群众有病，给予治疗。住院治疗的伤病员，因战斗而频繁流动，她和医院同志一起先把伤病员在群众家安置好再转移。是年春，医院周围地区脑膜炎流行，100多个病人到医院就医，经过治疗，全部痊愈，恢复健康。七月，痢疾蔓延，因敌人封锁，采购不到药品，医院采用土办法，用虾皮醋汤防治。个别重病号送进医院就死去，吓得护士不敢近前，引起医院人员思想波动，不安心工作。陈洛宁和医院领导一起，做好医护人员的思想工作。提高他（她）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好救死扶伤，减少军民疾病痛苦的荣誉感与责任心。为军民健康，团结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同目标，办好医院作贡献。

五、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

县城沦陷前，中共鄞县县委鉴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变本加厉

的镇压和日军将侵占县城的形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鄞西沿山地区，准备沦陷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鄞西沿山区党组织力量极为薄弱，党的支部尚未建立。为了做好建立根据地的准备。1940年春，女党员、进步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县委组织的以旅游为名，从鄞江到四明山考察地形的活动。是年夏、秋，一些党员从县城转移到鄞西，建立中共鄞西区委。1941年初，女党员李华、陈洛宁等进入鄞西，分别在边家小学、集士港小学以教师身份，在学校的师生和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向教师、学生介绍进步书刊，发展进步师生加入共产党，建立党的支部和抗日群众组织。宁波沦陷，县委根据当时的敌我力量情况，考虑公开建立党领导抗日武装有被国民党军队镇压的危险，决定采取秘密活动和灰色活动的方法进行领导抗日斗争。通过大革命时期党员、进步人士当时任梅园乡乡长边春甫与国民党鄞江区长、鄞西自卫游击大队长郭青白的关系，派党员进入自卫游击大队，做争取郭青白的工作，改造游击大队，协助郭建立了以共产党领导、挂“三青团鄞西区队”、“古林补习中学”，“鄞西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和“三青团工作组”等灰色组织。一些妇女党员分别参加这些组织，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女党员陈洛宁、陈晓云等加入郭青白游击大队、鄞西三青团区队。1942年夏陈洛宁任鄞西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总务股长，参加训练班的领导工作，李敏、唐慧珠、邵英等20多名女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训练班学习，陈洛宁、李华分别任训练班队长。这期训练班为开辟、建设鄞西抗日根据培养了骨干，成为鄞西民运工作的主力。训练班结束，一部分女党员、进步教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安排到学校教书，以学校为阵地在学生和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一部分以“三青团鄞西区队”名义组织工作组，由陈洛

宁、徐婴（男）带领，分赴樟村、古林两个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秋，鄞奉县委决定建立樟水、梅园、古林等区工委。陈洛宁、李华分别任梅园、古林区工委书记，陈晓云任梅园乡支部书记。吴春帆任古林补习中学支部书记。1943年3月，女党员陆温如进鄞西任鄞湖区工委书记，和徐婴、黄建英一起在鄞湖开辟新区。至此，鄞奉县委下属五个区有四个区委由女党员任书记。7月，女党员周洛民、鲁玲珊从中共浙东区委来鄞西打入郭青白的政工队，在章水区委书记李敏领导下开展民运工作。妇女干部在鄞西地区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骨干。她们以各种不同职业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农民、妇女，以办夜校、认字班和读书会等形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陆温如领导的鄞湖区工委，发动农民建立了乡农会，开展“二、五”减租和反抢粮斗争，保护农民利益。妇女干部在发动农民，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的同时，还帮助群众调解纠纷，促进家庭和群众的团结和睦。动员青年、学生参军，扩大抗日武装，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六、坚持反顽斗争

1943年“9·5”事变，林一新大队从郭青白的包围圈中拉出，配合新四军浙东纵队第三支队，将郭青白支队赶出鄞西，建立了鄞县六七两区联合办事处，鄞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10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领导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发动围剿，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开始。中旬，新四军浙东纵队在唐田与顽敌激战，鄞江区委书记李敏亲自带领30多个青年担架队去支前，沿途又动员了七八十个青年一同前往。陈晓云率领农民送粮食支援部队。党为了保存力量，夺取反顽自卫战争胜利，主力部队转移三北（镇

北、慈北、姚北），地方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鄞西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顽军向鄞西蜂拥压来，在主要山头、交通要道，筑碉堡、设岗哨，层层封锁。疯狂叫嚣：“要把四明山变成‘死人山，’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民运干部、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的女干部与游击队一起，化整为零，依靠群众，深入敌人据点，收集情报，宣传形势，组织群众给游击队送粮送饭，掩护伤病员。县交通联络站站长陈洛宁和女交通员，化装农村妇女收集传递情报。1944年1月初，县交通联络站接到顽军主力袭击鄞江桥的情报，立即派女交通员丁新民把情报送给鄞江、樟水等地坚持游击斗争的区中队。县委会议根据当时坚持斗争的严酷性，决定面目红了的干部和体弱有病及怀孕的女干部转移外地埋伏隐蔽，以保存力量。2月21日，李敏、袁春妍和一位男干部被敌逮捕，当天在樟村被残酷杀害。敌人在建岙村挨家挨户搜捕，县委秘书吴春帆于万分危急中被一农妇冒险认为亲生女儿，保护下来。坚持反顽斗争自此更为艰难。

敌人的疯狂搜捕、残酷杀害，吓不倒坚持斗争的妇女干部和妇女群众。周洛民、黄建英等把联络站搬到龙观孤山的密林中，在春寒斗峭、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里，日夜监视鄞江桥方面顽军、敌伪军的动静。她俩没有棉衣穿，没有棉被盖，不能烧火取暖做饭。俩人背靠背取暖，渴了啃冰雪，饿了吃群众送来的冷饭团。她们还背毛竹、木头到鄞江桥、凤岙等集市去卖，潜入敌人据点，收集情报。游击队缺少子弹，动员妇女到山上拾打仗时敌人丢失的子弹送给游击队。一次，县委在凤岙附近开会，县联络站把敌人前来扫荡的情报迅速报告县委。受到县委的表扬：“联络站群众工作做得好，消息真灵，情报准确。”

敌人实行“五户联保，一户‘通匪’，五户株连”后，形势更加险恶。在极艰难恶

劣的环境中，日夜坚持的男女抗日战士，精疲力尽，但斗志不减，和敌人周旋，牵制住敌伪顽的主力。1944年4月中旬，陈晓云召开梅园乡保长会议，宣传抗战和反顽自卫战争形势。会后，又到边家、下莲花、大岙等村向群众宣传，群情鼓舞。一个伪保长向敌人报告陈晓云的活动情况，敌人派人跟踪追捕。20日，她在丁香岭墩被逮捕。30日夜，壮烈就义。

隐蔽在崔岙村启明小学的女党员邵英，把敌人转移的消息送给坚持在樟水的游击队，带领游击队镇压了一个依靠敌人为非作歹的坏蛋，伸张了民气、鼓舞了人民反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斗志，镇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坏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坚持斗争的干部战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斗争艺术。最后，在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主力打击下，顽军逃离四明山和鄞西地区，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以敌人的失败，人民的胜利告终，鄞西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七、开展统战工作，建设抗日民主政权

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三大法宝之一。妇女干部在中共鄞奉县委、鄞县县委领导下，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鄞西地区乡村上层人士及其家属，发展进步势力，为建设抗日民主政权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4月，县城沦陷，国民党鄞江江区区长郭青白拉起一支鄞西自卫游击大队，中共鄞县县委派林一新、陈洛宁（女）等加入游击队争取郭青白和改造这支部队。陈洛宁协助林一新争取郭青白，重点做郭青白妻子工作，建立感情，影响郭青白。1941年下半年，敌伪对鄞西发动大扫荡，为了郭青白妻子的安全，陈洛宁把郭青白妻子转移安置到老家慈东，对她的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郭青白非常满意。在敌人大扫荡期间，郭青白在鄞西难以立足。在林一新、陈洛宁的帮助

下，通过慈东上层人士做慈东地方势力的工作，郭青白带部队暂时转移到慈东，保存了力量。此时，郭青白副手在大扫荡怯敌投降，部队面临严重威胁，林一新设谋严惩叛徒，取得郭青白的信任。

在敌人大扫荡中，陈洛宁感到妇女在部队中不便，她建议郭把女游击队员转移到地方，做抗日宣传。陈晓云到梅园乡乡公所当干事，负责经济工作。梅园乡乡长边春甫是陈晓云丈夫的叔叔，身体有病，乡公所的实际工作由陈晓云主持。1942年至1943年她在党内任梅园乡支部书记、梅园区工委书记。她利用乡公所的权力，为县委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筹集粮食，对保甲长进行教育。在郭青白支队政工队和“三青团鄞西区队”工作组工作的女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对乡、保长及其家属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消除他们因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宣传产生的恐共心理。对个别不听教育的顽固分子，收集其敲诈、剥削农民的罪行，发动农民向郭青白控告。

“9·5”事变后，鄞县六、七区成立联合办事处。陈晓云任梅园乡乡长。1944年6、

7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胜利，女党员干部舒文任鄞奉县委组织部长、兼樟水区区委书记、区长，罗异任鄞慈县委宣传部长，蒋静林、徐健、陆温如、陆子奇、周洛民、邵英、钱珂芹、孙英、黄建英等女同志，分别任区委副书记、区委委员。她们在县委领导下，整顿党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一些原国民党乡、保长及家属进行形势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教育。经过细致的工作，发展了进步势力，团结了各界人士，鄞西20多乡和保的政权全部得到改造，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妇女干部对争取过来的土匪部队家属进行教育，使他们思想稳定，促进了土匪部队的改造。1945年8月，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武装，解放了敌伪占据四明山大门最后一个据点——鄞江桥，鄞西全部解放，继而发动组织支援解放县城。同年9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大部分妇女党员干部随军北撤，陆子奇、冯和兰等女干部坚持鄞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更为艰难和坚决的斗争。

崔 岙 村 妇 女 支 援 抗 日

崔岙村妇女协会，是1943年下半年在李敏、周洛民、鲁玲珊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妇女组织识字班、学文化的基础上成立的。参加识字班的妇女有二、三十人。识字班除识字、学文化外，教师还向学员讲抗日道理、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积极分子在女党员崔松球、周小英等领导下，成立了村妇女协会。

在抗战时期，崔岙村妇女协会，积极在妇女中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封建礼教，动员

组织妇女做军鞋和袜子，挨家挨户动员捐献鸡蛋、鸭蛋，慰劳伤病员和支援前线。在敌人扫荡时掩护干部，照料伤病员。一次，敌在樟村围剿，鲁玲珊不能脱身。这时，正当崔根娣祖母去世丧葬，妇女们急中生智，教她披麻戴孝，混在送殡队伍中，鲁随送葬人群号淘痛哭，出村脱险。

1945年春，妇女协会响应党的号召，发动妇女，开荒种洋芋茼等大生产运动，获得丰收。

观 顶 妇 女 做 军 鞋、 拾 子 弹

1943年下半年，观顶村妇女在鄞江区委组织委员钱珂芹领导下，组织了妇女会，推选俞娘子当会长，徐根花为副会长。他们领导妇女，掩护干部，支持开辟建设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的扫荡和封锁，使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给养非常困难，妇女利用到鄞江桥赶市，打听敌人活动情况，探听情报。用卖毛竹、卖柴得来的钱，买来粮食、牙膏、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和一些违禁品，帮

助解决困难。发动妇女，缝制衣服、棉被和鞋、山袜，支援部队。

部队打仗，消耗子弹很多，得不到及时补给，子弹时常发生困难。俞娘子根据鄞江区长毛尹同志的布置，发动妇女上山，拾敌人在打仗时丢弃的子弹和子弹壳，送给部队，解决暂时困难。为反扫荡打败敌人，做出了许多贡献。

红岭抗日民主俱乐部

翁绍初

1944年浙东区党委提出加强根据地的自身建设，做好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做到一个不漏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鄞慈县办文教科科长胡野擒同志接受了行署黄源处长交代的任务，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办主任朱洪山竭力推荐红岭村为试点村。这个村基础好，要像上“井冈山”那样在红岭开辟社会教育的“根据地”，先在红岭点燃“星星之火”，办起一个农村抗日民主俱乐部，取得经验，推向整个根据地。

胡野擒科长带了八个刚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鄞慈社教队，8月到红岭，召集党支书、抗日民主保长、农会、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开碰头会。大家认为是农忙季节，干部要交粮征粮运粮藏粮，又要评议佃农向业主交租的合理负担，又要到平原去买粮贮备粮食，还要向日伪顽抗粮（当时狗腿子要进山来收钱粮），工作压在村干部身上是重重的，再要接受区党委提出“一个不漏”做社会教育工作，感到实在挤不出时间，也插不进任务为难，而面面相觑，稍候支部书记开了口：“县里如此重视，派这许多同志来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欢迎，任务再重也不怕，那就明天开始对我们一个个教育，保证一个也不漏掉。”胡野擒科长道：“不是我们工作队一个个对村民教育，是要你们与工作队一起进行社会教育。”村干部听到整个四明山区先在红岭村搞社会教育试点，是“星星之火”呀，大家顿时有了荣誉感，纷纷表示再忙也要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但怎样搞大家还没头绪。为找办

法，晚上继续开会。这时村里的许多青年人都来旁听，有的手里还捧着饭碗。胡科长在听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言以后，又对大家动员“现在反顽战争胜利了，根据地内平稳安定，各村应该考虑爱国活动，不要忘记日本鬼子还占领着县城和大集镇，大家要齐心协力把生产搞好，还要把大家团结搞好，日子过得愉快，还是成立个俱乐部”。听说搞俱乐部，村民和干部都瞪着眼睛听胡科长继续讲俱乐部是啥东西。他说：“俱乐部是城里有钱人玩乐的场所。我们共产党在上海也成立过工人俱乐部，是用来讲团结、学文化、求知识，发动革命的场所。阿拉山里头人也可以在俱乐部里学文化、求团结、长知识，做抗日工作。我们就把它叫做红岭村抗日民主俱乐部。”大家一致赞成。社教不另立一项工作，就是通过俱乐部进行。俱乐部成立了理事会，选出村中最活跃的七个青年担任，下面成立歌咏股、黑板报报导股、剧组宣传股、象棋乒乓球股。借用三层楼房做俱乐部活动室。社教队里有三个年轻姑娘，深入下去回来向胡科长反映：“房东大嫂讲不公平、啥事体只让男人外面去乐搞俱乐部，为啥没我们女人份。”于是俱乐部马上又加了一个股，叫“妇女股。”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妇女可顶半边天呀！一经她们左邻右舍唧哩呱啦的造舆论，俱乐部就热闹起来了。凡是女人一到就把男人的心拴住，搓麻将讲闲话的心想全没有了，白天生产劲头十足，晚上嘻嘻哈哈精神放松就活跃起来，李大妈当着大家讲，“你们把阿拉老头

心拴住、那真要烧高香、谢谢救命王菩萨共产党”。胡科长把毛昌岳老师也请来，当民校教师，自编油印书，学文化。俱乐部就这样风风火火的开展起来。青年人一面吃晚饭脚底已经痒痒的，心早到俱乐部去了。发动村里人不管老小能讲故事讲故事，能说笑话的说笑话，能敲、能唱、能拉、能走棋的各呈其能，各显神通。村里人在县城的翁寿根知道这个消息特地卖来一副响器赠送给俱乐部。象棋、棋盘都是自己制、乒乓台子用桌子拼，绳子拉网，照明灯油用打猎来皮毛卖掉换，还义务种了二亩马铃薯充经费。

俱乐部一切活动都从实际出发，红岭人对饥饿是深恶痛绝的，当区党委提出“二分红”运动时，红岭村人特别起劲。俱乐部宣传马上配合，动员“种多、种大”。这年马铃薯大丰收、家家户户放满角角落落。民主保长把一个十多两重的洋芋带到县办召开的生产会上报喜，受到朱洪山主任的表扬，并把消息登载在165期新浙东报上。村民们道，“今年介许多洋芋，救活了我们的命”

连年兵荒马乱，野猪有机会繁殖开来危害庄稼，白天会闯进村子来。村里成立了打猎队，俱乐部马上编出打野猪歌，文化教育教会打猎队员唱，山坳里响彻了“打野猪唷打野猪唷，依拉到底在那里啊唷、替我滚出来呀……今朝叫你去换胎、要依到东洋人哪堂哭哀哀唷”。这年冬天打来几十只野猪，大的一只重两百多斤，还有獐鹿、山鼠、田狗野兔。春节，区党委司令部机关也在红岭过年，用野味会餐，其味特殊，其乐融融。纵队司令还特意召集打猎队讲话，鼓励大家既要打野猪又要打鬼子，并奖励红岭村基干民兵两支步枪，每人两只长柄手榴弹。

村里的男女都参加识字活动。红岭村农民大都还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会写的也不多。妇女们凑在一起总是讲“婆婆馋、小姑

懒”的，有了识字班后，妇女们一面打草帽，一面讲“一撇、一捺、一竖、一横的”学写字，到处在背着唸着“阿拉老百姓、大家团结紧”“打倒东洋人、天下好太平”

“大家一条心，门前泥土比黄金”。这些自编的教材、泥土味特别强，好记、作用也好。看牛的牧童也组织起来。本来“看牛小孩调皮精”，组织了看牛队学文化，并担负放哨站岗送情报的任务。有一次，顽军侦察兵偷偷进村来，看牛小孩利用碰头阵（斗牛）以阻道，使我们同志转移，没出事。

红岭村人过去只知道背竹挑柴种田地的，自卑笨拙没文化，所以哼的也只是些“妹妹黑紫紫、口镶金牙齿”“天牌十二点大姑娘打胎”等，听了使人发呕。自从俱乐部成立后，人事也冒出来了，他们利用现成的曲调编歌唱：“说起新中国呀、越想越快乐”，“奴命生来苦真苦……廿年孤孀到如今，独养儿子抽壮丁”。孟姜女调唱十二个月花名“打日本”。小热昏卖唱“国民党头脑不灵清、十二个字打日本”。六字写来象灯盏，国民党专门出汉奸。陈公博呀周佛海，帮助鬼子发洋财，汪精卫呀落棺材”。还有“大生产”“打野猪”“马灯调”“杨柳青”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歌曲。红岭村抗日民主俱乐部确实做到了人人参加，个个有份，热火朝天，推动生产，促进革命。是一个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场所，受到了区党委和行署、县办的注意和重视，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并把经验登载在《新浙东报》上。1945年春节，胡野擒科长专门组织了红岭村俱乐部宣传队、由翁绍初、李世根等骨干带领在鄞西一带进行抗日爱国宣传。他们做了简易道具行头，一面开会动员，一面文艺宣传，动员青年参加革命部队去打日本鬼子。募集年糕、米糰、点心慰问军烈属，布鞋万宝袋劳军。俱乐部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社会教育的好形式。在全乡推广，热气腾腾地发展起来。